

交融 汇聚

新疆精品历史文物展中的重点文物



虎纹圆形金牌饰

6月16日,“交融汇聚——新疆精品历史文物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共展出新疆精品历史文物200余件(组),其中一级文物52件(组),包括金器、木器、陶器、青铜器、丝织品、简牍文书等品类。展览紧扣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的展示和价值阐释,紧扣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历史的阐明,充分展示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

金器

虎纹圆形金牌饰 战国,直径约5.3厘米,国家博物馆藏。金牌饰用圆形模压捶打的方法制出一只凸起的老虎纹样,整体卷曲成圆形,虎前体作曲立状,昂首呈起跃式,肩部和臀部装饰螺旋纹,饰有羽翼,后肢朝上翻转,极富动感,属于典型的欧亚草原风格的纹样。



八龙纹金带扣

八龙纹金带扣 汉代,9.7×5.9厘米,1975年焉耆回族自治县黑疙瘩墓地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金带扣方尾圆首呈马蹄形,扣孔窄小,扣舌较短,靠近前端有环孔,并装有活动扣舌,用以扣住腰带。金质模压捶打成型,镶嵌多颗宝石。扣面凸显1条大龙和7条小龙,设计繁缛。此类金带扣流行于汉晋时期,出土龙纹带扣的地区既是该时期中原王朝的郡地,如焉耆国、乐浪郡,也是汉文化的影响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出现汉式穿云、浪龙、群龙纹不足为奇。以龙纹辅以掐丝、金珠等细金工艺,配“青碧、闲瑰”的宝石镶嵌手法,应是受到北方草原民族金器工艺的影响。

土尔扈特银印 清代,10.8×10.8×9.8厘米,196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征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方形,铸有蹲兽印钮,蹲兽后足卷缩,前足支持地面,腹下空阔为钮穿。兽有眉眼及双耳,身上的毛皮为铸出。造型机警精巧,颇具动态。官印用满蒙两种文字刻出印文。制造工匠,铸造年号及编号则仅用汉文楷书刻于印侧。这枚印章是清政府对东归的土尔扈特蒙古诸部首领封爵赐印的历史物证。清政府封赐渥巴锡“乌纳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之印”,“乌纳恩苏珠克图”意为“忠诚、忠顺”,“卓里克图”意为“英勇、勇敢”,全印文即“忠诚的旧土尔扈特部英勇之王”。其他东归蒙古首领也分别封爵赐印。该印即为其中的“乌纳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北路盟盟长之印”。

青铜器

“君宜高官”铭文铜镜 汉代,12.3×12.3厘米,1959年民丰县尼雅遗址夫妻合葬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镜圆形,桥钮。镜缘呈内斜的宽边,边缘与中间凸起的同心圆之间恰好形成凹槽。同心圆内饰两组图案:外圆是八个联珠,联珠间点缀小圆纹;内圆是围绕镜钮翱翔的四只蝙蝠纹,蝙蝠之间嵌“君宜高官”四个小篆汉字。组孔内穿丝带。铜镜出土时装在绣花的锦套内,放在藻衣的最上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有类似形制的“君宜高官”铭文铜镜出土,洛浦县山普拉、尉犁县营盘等亦发现有汉式铜镜,体现了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木器

篋 春秋战国,75×12×28厘米,2003年都善县洋海墓地出土,吐鲁番博物馆藏。篋为音箱颈和颈头为一根圆木挖削成一体,颈头穿孔装弦杆。音箱长方形,底部中间有圆形发音孔,颈和音箱厚度相等,颈头略宽扁,孔中插弦杆,弦首有明显的五道系弦的痕迹。

陶器

人首微笑牛头陶饮器 唐代,19.5×7.5厘米,1976年和田市约特干遗址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陶饮器上部分是平宽沿口,人首,下部是牛头式小圆孔。人首戴高顶螺帽,额广眉隆,鼻梁挺拔,上唇上的胡须外展卷翘,厚唇似合非合,面带微笑,下颌长须呈波状。牛头接紧人首颈部,微微上翘。牛角竖立拢圆,牛眼圆瞪,牛嘴撮拢成小圆。饮器上下两部分内腔相通。这种饮器造型源自米通(Rhyton),即一种末端采用动物(或人形)的角杯,来源于中亚细亚和地中海地区常见流行的饮酒器具,反映了丝绸之路东西方之间的交流。



蓝色人首马身纹缂毛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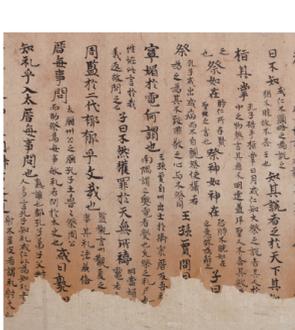
蓝色人首马身纹缂毛布 汉代,116×48厘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1984年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原为一大型壁挂的局部,后被裁剪成一条裤子,两裤腿已分离。图案为“马人”,在蓝色地上,由四瓣花组成的菱格内,织出人首马身的“马人”。双手持一长管乐器作吹奏状,身披兽皮向后飘扬;下部是在红色地上显出手持长矛的武士形象,武士深目、高鼻、厚唇,黑发曲卷垂肩,身着饰花带的红长衣。这种公元前后由西方传到新疆的缂毛织物采用通经断纬的织造技术,对中国唐宋时期缂丝工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烟色狩猎纹印花绢 唐代,44×29厘米,1973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绢物为多块拼对复原,存左幅边,平纹地。主图案为一头向右奔跑状马,上骑一回首射猎狩猎者,马后为一立状张牙舞爪狮子,猎狗追兔,猎鹰捕鸟,以及植物环绕狩猎者。整个画面生动写实,气氛紧张。马的颈后有烙印,应为当时官马的标记。图案上下连续,左右对称,反映唐代上层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情景。采用夹缬花板印花,先染绢为烟色,用模板夹缬物,涂浆剂,除去深色,留有浅白或浅黄色图案,洗净浆剂即为成品。这件典型的带有萨珊王朝风格的狩猎纹印花绢是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因素相互演化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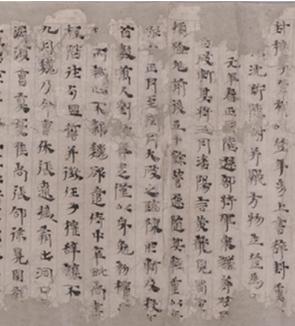
书画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 晋代,72×22厘米,1965年吐鲁番市英沙古城外佛塔内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该文书残存40行,约570字,中有残缺。文书出土的陶简中还有写本佛经残卷十三种、桦树皮汉字文书、梵文贝叶两片和回鹘文字木简等文物。残卷起自魏黄初二年(221)刘劭率兵伐吴,至吴黄武元年(222)九月,魏伐吴,权“单辞上书”,及魏文帝曹丕回书止。

景龙四年下天寿抄《论语郑玄注》 唐,538×27厘米,1967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吐鲁番博物馆藏。此件文书为“唐景龙四年(710)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里义年”仅12岁的学生下天寿书写,内容为《论语》中《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以及《为政》部分卷末还写有《三台词》《千字文》和其他诗句等。有意思的是,这位12岁的学生下天寿,在做完作业后,还写下了两首充满童趣的绝句,诗云:“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侧书还侧读,还侧侧眼看。”“写书今日了,先生莫成油(嫌迟)。明朝是假(假)日,早放学生归。”诗作生动刻画出顽童心理。这些随手写下的文字使得这个卷子不再是冰冷的古籍,反而充满了人类心灵古今相接的鲜活气息。从文献角度看,《论语郑玄注》在唐以后就失传了,虽然20世纪以来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不少《论语郑玄注》残本,但下天寿的这个抄本是这些残本中保存较好且最长的卷子,为古代民间书法艺术以及儒家经典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现已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文博)



景龙四年下天寿抄《论语郑玄注》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

人类化石讲述“东方故乡”——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考古发现重大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对猿猴谱系的实证追溯,一直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19世纪以降,在生物进化论学说的广泛影响下,南方古猿、能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远古人类在世界各地被陆续发现。最新考古成果表明,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人类起源最早之地。

中国是世界上古人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从1929年周口店遗址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头骨化石起至今,我国境内已有70多处遗址发现了史前人类化石。分布在广袤中华大地上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金牛山人、山顶洞人等诸多古人类化石,连同大量伴生遗存,共同构成了人类演化发展的直接证据。20世纪80年代后,古DNA(脱氧核糖核酸)开始成为研究人类遗传与演化历史的有力工具,也为探寻人类起源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人类史研究更加异彩纷呈。

近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的“东方故乡——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展览,依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国家博物馆的丰富馆藏,通过物竞天择、矗立东方、智慧灵长、现代之路四个单元的220余件(组)文物,将近百年来中国在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和古DNA研究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展现出来,全面讲述人类从猿到人的百万年活动历程,系统阐释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和文明流变。经过旧石器时代的经验积累,人类在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等方面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众多新石器时代文化。

“物竞天择”单元以古脊椎动物演变历程展现生物多样性及与环境的依存关系。地球是已知唯一有生命的星球,从35亿多年前的单细胞生物到充满智慧的人类,生命沿着时间的维度向前推进,始终紧紧依赖于环境。地壳运动、气候与温度变化,都会影响生物的组成和分布。脊椎动物,包括现生或见于化石记录的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和绝大多数的鱼类,它们的分布和演化是既具有全球性,也有鲜明的地域特征。5亿多年前,第一条鱼在寒武纪的海洋中诞生,生命悄然挺起脊梁,从此更加坚强;3亿多年前,鱼类中的一群勇士率先登陆,从此广袤的陆地不再寂寞;2亿多年前,翼龙征服了无垠的蓝天,并最终被鸟类接替;大约同时,哺乳动物已经在恐龙统治的世界中悄然兴起,直到6600万年前的一次良机,使它们成为地球的新主人,其中一支演化为现在的人类。

“矗立东方”单元以元谋人、蓝田人、泥河湾、北京人等重要发现展示中国直立人的演变形态。中国古人类演化的研究始于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迄今已经在中国境内70余处地点发现了更新世古人类化石。21世纪以来,国际古人类学界对东亚地区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关注不断增加,尤其在中国是否存在早于直立人的古人类成员、中国直立人的演化位置、中国早期智人的来源、中国早期现代人出现的时间和扩散路径方面引发了许多争论。

元谋人牙齿(图1),距今170万年,1965年发现于云南元谋盆地。这两枚牙齿分别是上颌左侧和右侧中门齿,根据其色泽、尺寸及磨损程度判



图1



图2



图3



图4

断,可能属于同一成年个体。门齿舌面呈铲形,齿冠基部结节显著突起,齿冠和齿根都显得较粗壮,在形态特征和测量尺寸方面都与周口店直立人相似。尽管对元谋人的生存年代还有争议,但古人类学界普遍认可距今170万年的年代数据,并将元谋人作为中国最早的直立人。

郧县人头骨(图2),距今100万年,1989~1990年在中国湖北省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发现,为两件古人类头骨化石。两件头骨受到地层的挤压,形状虽然严重扭曲变形,但都保存有完整的脑颅和基本完整的面颅。郧县人的颅容量为1100毫升左右,接近北京猿人的平均均值。头骨既有明显的直立人特征,又具有某些古老型智人的性状。2022年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是欧亚内陆迄今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之一。

周口店直立人头骨(图3),距今70万~30万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发现,又名北京猿人、中国猿人、北京人,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个体数量最多的直立人化石。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全部丢失。周口店直立人头骨低矮,最大宽度较低,额骨低平且明显向后倾斜。眉脊非常粗壮,形成眶上圆枕,两侧眉脊被粗壮的眉间隆起连成一体,眶上圆枕后上颌骨大而粗壮,下颌骨大而粗壮,下颌体前部明显向下后方倾斜,无下颌。牙齿宽大,咬合面比现代人的皱纹多,上颌门齿舌面为典型的铲形。

“智慧灵长”单元展现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智人的发展历程。中更新世中、晚期到晚更新世早期过渡阶段,欧洲、非洲和亚洲发现了一些体质特征处于直立人和现代人之间的古老型人类。根据其发现的地点、分布范围或者大体形态特征,这些古人类成员先后被命名为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古老型智人、早期智人、晚期古老型人类或者智人。中国境内古老型智人的生存时代为距今30~10万年,典型代表有金牛山人、大荔人、马坝人、桐梓人、盘县大洞人、丁村人等。

“现代之路”单元借助基因组数据成果,展示现代人的直系祖先,即早期现代人的演变格局。以往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现代人化石非常罕见,但缺少早于4.5万年、保存完好的化石记录。近10年来,中国古人类学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先后在周口店田园洞、湖北郧西黄龙洞、广西崇左智人洞和湖南道县等地发现了早期现代人化石。对这些人类的年代测定和形态研究显示,在距今10~8万年间华南地区出现了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而与这群现代人同时代的北方地区,还生活着形态特征更原始的“土著居民”。

山顶洞人头骨(图4),距今3.8万~3.5万年,1933~1934年发现于周口店第一地点顶部的小洞——山顶洞,发掘出人类3个头骨和其他骨化石,共代表至少7个或8个个体。3个头骨分别属于老年男性、青年女性和中年女性。老年男性,头低矮,额骨较扁塌,眉弓粗壮,有铲形门齿。青年女性头骨曾因长期缠头而致变形,头型很高,眼眶较低,鼻状孔颇宽,嘴部突出。中年女性的头顶正中高耸,两边较平,鼻状孔较狭,眼眶较高。这三个头骨有许多共同特征,如头骨硕大,上面部低矮,整个面部中等程度的突出,眼眶较低,梨状孔较阔,其下缘呈鼻窝型等,类似于其他中国晚更新世化石,接近现代黄种人。(文编)

引领古人类演化研究 探源华夏族群源流

邓涛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建所伊始就伴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而发展。古脊椎所的最早前身为1929年在北京成立,同年12月2日,在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杨钟键先生的指导下,裴文在中先生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自此开启了中国的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研究。90多年来,作为我国唯一专门从事古人类演化研究的学术机构,也是本领域国际上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研究中心之一,始终聚焦从鱼到人脉络、东亚直立人来源、现代人类起源、中华民族族群群体演化过程等重大问题,开展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研究,为探源华夏族群源流、文化起源做出了积极贡献,并不断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在古人类研究方面,古脊椎所通过持续大范围的野外科考,先后在云南元谋、北京周口店、湖北郧西、广西崇左、安徽东至、山西许家窑、陕西大荔、广东马坝等地发现新的古人类化石,不断将东亚地区人类出现的最早时间向前推移,并基于化石形态的对比实证研究,提出了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说”

和“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曾发表专题文章,高度评价我国古人类学研究进展,认为“中国正在改写人类起源学说”。

近年来,古脊椎所在国内率先将高精度CT、同步辐射、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图像分析等新技术手段应用于古人类研究,革新了本领域的研究范式,大大推进了该领域研究进展。尤其是对古核基因组捕获技术的突破与应用,使大规模研究古DNA成为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人类学、演化遗传学等相关学科发展。利用这项技术,解码了东亚最古老现代人“田园洞人”基因组,揭示了东亚史前人类的多样性与遗传历史的复杂性;大规模、系统性研究了我国南北方古人群基因组,揭示了近万年来中国人群南北方分化格局、主体遗传连续性、双向迁徙过程,以及南岛语系人群的中国南方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这些工作填补了东亚史前人类遗传与演化的重要信息缺口,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团队独立开展相关研究的技术与创新实力。(下转8版)